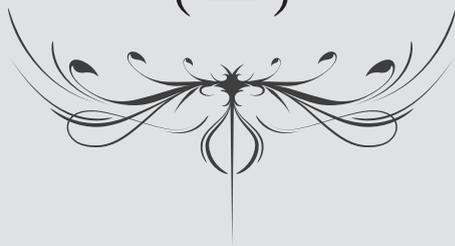


(一)



古今名著英译前言



# 《诗经》英译本序

《诗经》是哺育了中国历代作家的文学名著。《国风》是民歌，《小雅》是乐曲，《大雅》是史诗，《颂》是祭词。诗可以兴（启发，如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），可以观（反映，如《大雅》），可以群（交流，如《小雅》），可以怨（如《国风》）。《诗经》是反映了礼乐治国的文化瑰宝。英译本对中西文化交流，建立新世纪的世界文化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

欧美国家很少有人知道：世界上最早的诗集之一是中国的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包括 305 篇诗歌，大约产生于 2500 年前。最早的一篇据陈子展《诗经直解》，是《商颂》中的《长发》，约作于公元前 1713 年。最晚的一篇，一说是《秦风》中的《无衣》，公元前 505 年申包胥哭秦庭时，秦哀公为代赋《无衣》之诗；一说是《陈风》中的《株林》，是刺陈灵公“淫乎夏姬”之诗，据《诗经直解》，约作于公元前 599 年。两说都是公元前 6 世纪。

《诗经》按照音乐类型分为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和《颂》四个部分。《国风》160 篇包括周王室的乐官在 15 个诸侯国的封地采

集到的民歌民谣。《小雅》74篇多是西周贵族宴会用的乐章。《大雅》31篇多用于朝廷庆典。《颂》40篇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赞歌，又分为《周颂》31篇，《鲁颂》4篇，《商颂》5篇。《商颂》最早，约作于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，相传是西周后期宋国大夫正考甫从周太师处得到的；一说是正考甫所作，商王室的后人宋襄公祭祀祖先所用，但是证据不足。

西周早期的诗篇约作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，包括全部《周颂》，一部分《大雅》和一小部分《国风》。大部分诗篇都是“赋”（叙事诗）或史诗，最出色的是《大雅》中的《生民》、《公刘》、《邶》、《黄矣》和《大明》，这些史诗描写了周王朝是如何建立，商王朝是如何灭亡的。西周后期的诗篇约作于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，包括大部分《大雅》，几乎全部《小雅》，还有一小部分《国风》。有些雅歌赞颂了中兴的周宣王（公元前9世纪末至公元前8世纪初在位）南征北战的赫赫武功，如《大雅·常武》描写了宣王东征徐国的胜利；《小雅·六月》记载了尹吉甫北伐玁狁的史实；《小雅·采芣》叙述了方叔南征荆楚的武功。这些意气风发、斗志昂扬、威震四方的赞歌颂词的作者，有的是朝廷的史官，有的却是统率三军的大将，如《六月》的作者是“张仲孝友”，而《大雅》中的《崧高》和《烝民》却是“文武吉甫”赠别申伯和仲山甫时所作。这些诗篇虽然极尽了赞颂之能事，但是比起《小雅》中描述士兵亲身经历的《采薇》来，却又显得稍逊一筹；《采薇》中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传诵千古，被誉为“《诗》三百中最佳之句”。

《诗经》中最好的作品还是《国风》，包括东周时期采集到的民歌民谣，大部分作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。民歌大都纯朴自然，反映古代人民各方面的生活，劳动斗争，思想感情，喜怒哀乐。如《豳风·七月》描写了农民一年的劳动生活，他们耕地，织布，打猎，为主人酿酒，修建房屋，自己却不得温饱。《魏风·伐檀》讽刺了不劳而获、贪得无厌的贵族。《周官·芣苢》是农村妇女采集车

前子的劳动之歌。《召南·野有死麕》描写了猎人如何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少女。《周南·关雎》叙述一对青年男女如何在春天钟情，在夏天求爱，在秋天定亲，在冬天结合的过程。《唐风·鸛羽》表达了农民在外服役的辛苦。《邶风·日月》写出了弃妇的不幸。《击鼓》抒发了士兵思家之情，而《燕燕》和《绿衣》却描写了生离死别的痛苦。

孔子说过：“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诗可以启发，可以反映，可以交流，可以讥讽。在我看来，《国风》主要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，启发他们去做好事，讽刺了统治者的丑恶行为。如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反映了古代人民的家庭生活；《卫风》、《邶风》讽刺了贵族腐化堕落的习俗；《郑风》、《陈风》反映了民间的爱情生活；《豳风》启发了人民对周公的拥戴。

《小雅》主要用于贵族之间交流，反映了贵族的生活，也指责了他们的错误。如《鹿鸣之什》中有六篇用于王家宴会；《南有嘉鱼之什》中有两篇用于诸侯宴会，两篇描写王家狩猎；《鸿雁之什》中第一篇发泄了对乱世的不满，《祈父》却是士兵对大臣的怨言；《节南山之什》都是对周幽王宠爱褒姒的批评；《谷风之什》中有被压迫贵族的呼声；《甫田之什》中有收获时贵族祭神求福的乐歌，其中《宾之出筵》写贵族酗酒的醉态，栩栩如生，是不可多得的佳作；《鱼藻之什》则多是对周厉王暴虐无道的批评。不过《小雅》有些诗篇可以收入《国风》或《大雅》中，如《采薇》、《出车》记载西伯、南仲西征的事，可以算是《大雅》。

《大雅》记载史实，反映统治者的生活。如《文王之什》中有六篇记文王事，两篇记武王事，《绵》记古公亶父自豳迁岐，《皇矣》记太王、王季及文王伐密伐崇的事，都是史诗；《生民之什》中第一篇叙述周民族始祖后稷的神话，《假乐》、《洞酌》、《卷阿》是成王的诗，《民劳》、《板》是讽刺厉王的诗；《荡之什》中有三篇讽刺厉王，《云汉》等三篇赞美宣王，《崧高》赞美申伯，《烝民》赞美仲山甫，《韩奕》赞美韩侯，《瞻仰》、《召旻》讽刺幽王。所以《大雅》可以

算是西周王室的兴衰史。

《颂》主要用来赞美王室祖先的丰功伟绩，启发后人对祖先的崇拜，达到齐家治国的目的。《周颂·清庙之什》中歌颂文王、武王，成王的各有三篇，《思文》一篇歌颂后稷。《臣工之什》第一篇是农事诗，第十篇《武》是宗庙舞歌，其他八篇都是祭祀诗。《闵予小子之什》据说是周公摄政时所作，前七篇都与成王有关；《访落》是成王登基的赞歌，《敬之》写成王君臣关系，《小毖》写成王自我批评，《载芟》是农事诗，《良耜》、《丝衣》是祭祀诗，《酌》等四篇和《武》一样是宗庙舞歌。《鲁颂》只有四篇，都是赞美鲁僖公的，僖公其实是个平庸之辈，但是作为周公的后裔，享受了王室祭典的特权，受到过孔子的批评。《商颂》是《诗经》中最古老的诗篇。《长发》是商王朝的开国史；《那》等三篇歌颂汤武开国之君，《殷武》赞美武丁中兴之举。从内容看，说《商颂》是宋人祭祖乐章，似乎不能令人信服。大致说来，《颂》可以兴，《大雅》可以观，《小雅》可以群，《国风》可以怨。

《诗经》中常用的三种修辞手法是“赋”、“比”、“兴”，“赋”是直叙其事，“比”包括明喻、暗喻，“兴”是“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”。《魏风·硕鼠》就是以动物比人的一个好例子。在这首诗中，硕鼠的形象和全诗主题有关。有时，“先言他物”和“所咏之辞”并无直接关系，只有作者感情上的联系，也就是说，同为作者爱憎的对象，如《邶风·墙有茨》，“茨”与“中冓之言”并无关系，只是同为作者所憎。有时，“先言他物”不过是为了押韵顺口的缘故，如《召南·草虫》。

《诗经》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调叠咏很多，可以增强诗歌的情韵，加深读者的印象。有时一行只变一两个字，韵也变了，诗情也发展了；有时整行重复，有时整段重复，如《周南·采芣》和《召南·摽有梅》。

中国古诗的句式大致可以分为四言体、五言体、七言体和杂言体。四言诗出现最早，在《诗经》中也最多，可以说是已臻成熟了。四

言体每行只有两个音步，比起五言体、七言体来，节奏更加干脆利落。《诗经》中的绝大部分诗歌都押韵，韵式多种多样：有的每行押韵，有的隔行押韵，有的整段一韵到底，有的行内有韵，有的还用双声加强音乐效果。

《诗经》中的词汇丰富，尤其是叠声、双声、韵语的运用，变化多端，使得诗歌描写生动，声调悦耳。此外，还有叠句、合唱等，也是民间歌谣常用的手法。

《诗经》的“风、雅、颂、赋、比、兴”叫做六艺，受到后世高度评价，对历代诗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试比较下列引文，可见一斑。

1. 《周颂·桓》：保有厥士，于以四方。

刘邦《大风歌》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？

2. 《唐风·蟋蟀》：今我不乐，日月其除！

《古诗十九首》：为乐当及时，何能待来兹？

3. 《邶风·燕燕》：瞻望弗及，泣涕如雨。

苏武《别妻》：握手一长叹，泪为生别滋。

4. 《卫风·氓》：三岁为妇，靡室劳矣。

夙兴夜寐，靡有朝矣。

《孔雀东南飞》：鸡鸣入机织，夜夜不得息。

三日断五匹，大人故嫌迟。

5. 《陈风·衡门》：衡门之下，可以栖迟。

泌之洋洋，可以乐饥。

陶潜《归园田居》：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。

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

6. 《陈风·月出》：月出皎兮！佼人僚兮！

李白《越女词》：镜湖水如月，耶溪女如雪。

7. 《鲁颂·閟宫》：泰山岩岩，鲁邦所詹。

杜甫《望岳》：岱宗夫如何？齐鲁青未了。

8. 《齐风·东方之日》: 东方之日兮。

彼姝者子，在我室兮。

在我室兮，履我既兮。

李商隐《无题》: 金蟾啮锁烧香入，

玉虎牵丝汲井回。

9. 《魏风·硕鼠》: 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！

三岁贯女，莫我肯顾。

曹邕《官仓鼠》: 官仓老鼠大如斗，

见人开仓亦不走。

健儿无粮百姓饥，

谁遣朝朝入君口？

10. 《陈风·东门之杨》: 东门之杨，其叶牂牂。

昏以为期，明星煌煌。

欧阳修《生查子》: 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

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

从以上十例可以看出《诗经》对历代诗人影响多大。《诗经》在国内虽然非常重要，但在国外并不广为人知，直到 18 世纪威廉·琼斯爵士才把部分诗篇译成英文散体和韵体，据说对英国 19 世纪诗人拜伦、雪莱、丁尼生等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，英国理雅各才把全部《诗经》译成散体英文，在中国香港出版；到 1871 年，他又在伦敦出版了《诗经》305 篇的韵体译本，并于 1967 年在纽约重印。他的译本注释丰富，是学者的译文，但不如原文简朴。1891 年伦敦又出版了艾伦和詹宁斯的《诗经》英译本：艾本押韵，译文随意改动原文，有增有删，与其说是翻译，不如说是改写。吕叔湘编《中诗英译比录》选了几篇艾译；詹译本则没有见到，不好妄评。

到了 20 世纪，1906 年伦敦出版了克拉默宾的韵体译本，他译的《玉笛集》（中国诗选）10 年之内重印了 10 次，可算畅销；从《中诗英译比录》中选选的《氓》看来，他的译文不像艾译那样自由，

而且格律也不如艾严谨。1913年在波士顿出版了海伦·华德尔的韵体译本，从她译的《氓》看来，删节太多，而且重新组织。她的译本销路较好，20年内重印6次。和她相反，路易丝·哈芒德走了另一个极端，她试图把一个中文译成一个英文音节，毫不增减，而且保持原诗韵律。她的《邶风·式微》译得很成功，但不知道她译了多少篇《诗经》。

《诗经》的早期译者都用韵体。庞德是在理雅各之后，第一个把《诗经》译成自由体的诗人。他的译本于1915年在剑桥出版，1954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重印。他认为译诗是个创造性的问题，他的译文经常被当成创作而选入近代英美诗选，影响很大，但译文错误很多，不能算是佳译。另外一个把《诗经》译成自由诗的韦理，他的译本于1937年在伦敦出版。他在《译自中文》的序中说：中国的旧诗句句都有一定的字数，必须用韵，很像英国的传统诗，而不像欧美今天的自由诗。但他译诗却不用韵，因为他认为用韵不可能不因声损义；他用一个重读音节来代表一个汉字，并将这种格律比之为英诗的非韵体。庞德和韦理都不知道，译诗如不传达原诗的音美，就不能保存原诗的意美。《诗经》总的说来是用韵的，译诗如不用韵，绝不可能产生和原诗相似的效果。恰恰相反，用韵的音美有时反而有助于传达原诗的意美。这就是说，用韵固然可能因声损义，不用韵则一定因声损义，用韵损义的程度反比不用韵小。试比较韦理《周南·关雎》和本书的译文，韦理“关关雎鸠”，无论意美、音美，都远不如本书。

诗无达诂，就以《关雎》而论，“雎鸠”到底是什么鸟？“君子”到底是什么人？“苕菜”到底是什么菜？众说纷纭。而“左右流之”，有人说“流”是“求”或“采”，韦理就是这样译的，但读来觉得牵强。我认为译诗要博采众家之长，而对《关雎》解释得最好的，是《诗经鉴赏集》王气中的文章。他说“关关”两句表示时令，夏历二月春分季节，鸟兽开始交配。“苕菜”开春发芽，入夏才浮出水

面。“左右流之”，是说荇菜在水面上或左或右地浮动的样子。“左右采之”，是说荇菜到了夏秋之间长大可采，比兴新郎新娘双方的恋爱已经达到成熟阶段；“琴瑟友之”说明还举行过订婚的仪式。“左右芼之”说明他们的结婚季节，是在秋冬农事生活闲隙，荇菜成熟的时候，人们要把它熟食了。总之，《关雎》歌唱新婚夫妇在一年内由相识、求爱、热恋、订盟以至结婚的全过程。这样一讲，才会明白孔子为什么把《关雎》列为《诗经》之首，因为这篇诗概括了我国礼乐治国的哲学。由此可见，外国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深刻的了解，是不大可能译好《诗经》的。

一些诗有不同的解释，难分高下。如《周南·卷耳》，余冠英说“这是女子怀念征夫的诗。她在采卷耳的时候想起了远行的丈夫，幻想他在上山了，过冈了，马病了，人累了，又幻想他在饮酒自宽。”钱锺书认为这不是幻想，而是实事：“作诗之人不必即诗中所咏之人，妇与夫皆诗中入，诗人代言其情事，故各曰‘我’。……夫为一篇之主而妇为宾也。男女两人处两地而情事一时，批尾家谓之‘双管齐下’，章回小说谓之‘话分两头’。”从真的观点看来，钱说更高；但从美的观点来看，则又以余说为上，因为“不己之怀人，而愈见怀人情笃。”因此，我在河南译本中采用余说，而在湖南译本中则采用钱说；这样更可以看出《诗经》内涵的丰富。又如《召南·小星》，传统的解释是指小妾，以致“小星”成了妾的代称；今天一般认为是写小臣出差；我也是在河南译本中用前说，在湖南译本中用后说。但如《唐风·无衣》，一般认为是览衣感旧，睹物思人；《诗经楚辞鉴赏辞典》却认为是伤逝，情真意切，不胜依依，我就两本都按伤逝译了。总而言之，我的英译希望尽可能传达《诗经》的意美、音美和形美，并且与以往的各种语体译文也不尽相同。

《诗经》是我国古代的教科书，对建立及维护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，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。概括起来，儒家治国之道就是“礼乐”二字。“礼”模仿自然外在秩序，“乐”模仿自然内在的和谐；“礼”

可以养性，“乐”可以怡情；“礼”是“义”的外化，“乐”是“仁”的外化。做人要重“仁义”，治国要重“礼乐”，这就是中国文化几千年不衰的原因。世界各国，希腊罗马有古无今，英美法德俄有今无古，印度埃及都曾遭受亡国之痛，只有中国屹立世界东方，几千年如一日，对世界文明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。因此，把中国文化的瑰宝《诗经》译成具有意美、音美和形美的韵文，对东西文化的交流，对 21 世纪世界文化的建立，一定会有不可低估的意义。

1993 年 4 月 18 日

## 《论语》英译本序

孔子（公元前 551—前 479）是我国影响最大的，平凡中见伟大的人物。《论语》是孔子言行的真实记录，他在言谈中很少说“什么是”的问题，总是回答“如何做”的方法，但却具有超越时空的长久价值。《论语》重视情感教育，以学习本身为乐，从赏心悦目到怡性悦情，从社交行为到礼制道德，都可看出“克己复礼”的乐感。《论语》重视道德，把政治、伦理、宗教三者结合为一，认为政治是公德，伦理是私德，并以乐感或美感代替宗教，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超道德的宗教境界，领会到人生的本体是如何生活，为什么活，活得怎样？孔子思想的特点是不重逻辑思维，不重归纳演绎，而重直观联想，重类比关系。结果，《论语》在塑造、构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方面，成了整个社会言行、公私生活、思想意识的指引规范，渗透在政教体制、社会习俗、心理习惯、人的思想行为、言语活动之中。

据《中国图书商报评论周刊》（1999年9月9日）说，七十五位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1988 年在巴黎聚会，发表了一个声明，大意是说：人类如果要过和平幸福的生活，应该回到 2500 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。孔子的智慧是什么？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，

可以说是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在《圣经》中，也有一句差不多的话，那就是：“己之所欲，亦施于人。”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？《圣经》中的名言是积极的，而孔子的话是消极的。《圣经》说自己相信什么，就要别人也信；孔子却说自己不愿做什么，就不要别人做什么。如果自己相信自由民主，并且要求别人也相信自由民主，这是符合《圣经》的积极思想；如果自己不相信什么宗教，也不强求别人相信什么宗教，这就符合孔子的消极思想。在中世纪，发生了旧教和新教的长年战争，因为旧教徒信仰旧教，并且把不信旧教的新教徒叫做异教徒，甚至要把他们处死，所以发生了宗教战争。而在中国，两千年来，孔子的思想与佛教道教和平共处，统治者既不要人信佛教或道教，也不勉强佛教徒或道教徒信仰孔子，所以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。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思想的影响，也可以看出孔子的智慧。

孔子的思想言行，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，那大约是一个“仁”字。什么是“仁”？《论语》第十七章中说：“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：‘能行五者于天下，为仁矣。’‘请问之。’曰：‘恭宽信敏惠。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’”这就是说，仁是尊敬，尊重别人像尊重自己一样；仁是宽厚，要严于责己，宽以待人，容忍不同的意见；仁是信任，信任别人，自己也要值得别人信任；仁是勤敏，勤勤恳恳，全心全意对待别人；仁是恩惠，要为人做好事，绝不损人利己。总之，就是“仁者爱人”，对待别人像对自己一样，将心比心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

孔子要行仁政，就是礼乐之治。礼乐是“仁”的外化。据冯友兰说，礼模仿自然界外在的秩序，乐模仿自然界内在的和谐。礼可以养性，乐可以怡情。做人要重仁义，治国要重礼乐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。如果比较一下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文化教育，就可以发现，在孔子重视礼乐的时候，西方的柏拉图却在《理想国》中强调体育和音乐。由此可见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，都很重视音乐教育，

也就是乐育。所不同的，中国更重礼教，就是维持社会秩序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；西方更重体育，要使人人体力更强，跑得更快，跳得更高、更远。如果说乐育使人耳聪目明，成为智者，礼教却使人循规蹈矩，成为好人；体育则使人身强力壮，成为强人。这就是孔子和柏拉图的异同，他们使东西方的教育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：东方要培养智者仁者，西方要培养智者勇者。

智、仁、勇三者的关系，不但表明了中西教育哲学的异同，也表现在中西方的文学作品之中。如西方的《荷马史诗》，《伊利亚特》歌颂了阿契力士和赫克托等的英雄主义，《奥德赛》则赞美了尤利西斯的智慧和勇敢。而赫克托离开妻子上战场时的临别赠言是个典型的例子：

冲锋陷阵我带头，  
论功行赏不落后。

在中国的《诗经》中，歌颂的是圣君贤臣，对武王伐纣时的军师姜尚，只说了一句：

维师尚父，时维鹰扬。

把姜尚比做飞扬的雄鹰，和《荷马史诗》的描写相比，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而在《论语》第十一章中子路说：“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由也为之。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”对这样的勇士，孔子只是置之一笑。

孔子不赞赏子路的勇敢，而赞美颜回的智慧，因为“回也闻一以知十”，又说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二过”，这就是赞美他的德行了。还说：“贤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饮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”这说明了孔子的乐育思想。颜回如何能在贫困中“不改其乐”呢？《论语》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这说明了好学和乐育的关系，颜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他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”。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哲学思想的基础是乐感。乐感不但是孔子思想的基

础，也是最高的境界，所以他说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乐感就是孔子的智慧。乐感如何能产生智慧呢？孔子又说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由此可见，诗和礼乐结合起来，就可以培育智者。孔子还说：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孔子赞赏知者仁者，却不赞赏勇者强者。这种修文偃武，重德轻才，顺应自然，而不是征服自然，天人合一，而不是人定胜天的思想，结果造成了中国两千年以来重柔轻刚的风气，积弱成习的后患。

而在西方，《圣经》上说，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，却把他们赶出天堂乐园，因为他们偷吃了智慧的禁果。这就是说，上帝禁止人有智慧，而人违反了上帝的禁令，不是顺应自然，而是征服自然，违抗了上帝的意志，所以人有负罪之感。就是罪感，而不是乐感，这是中西文化不同的一点。柏拉图在他的《理想国》中也说，要把诗人赶出国土，可见希腊哲学也排斥诗人的智慧。当宗教和哲学都不重视智者的时候，智慧的解释权就落到教会神职人员手中。因此，当一派神职人员只相信自己的宗派，而把不同的宗派叫做异教，并且要把异教徒活活烧死，因为他们反对上帝，所以有罪。这样用暴力取代了智慧，宗教战争就爆发了，中世纪变成了黑暗时代，更甚的是，宗教战争发展成为对另一种宗教的十字军东征，于是天下大乱。直到文艺复兴时期，盗火者从天上盗来了文明的火种，西方的智者才觉醒了，他们摆脱了偷吃智慧禁果的罪感，重新把西方建设成繁荣富强的文明国家。

而在东方，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使儒家思想几乎成了国教。由于“子不语：怪，力，乱，神。”所以两千年来，中国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。从公元前1世纪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繁荣富强的文明国家。据法国《回声报》的统计，1820年中国生产总值还是世界第一，占全球总产值30%。假如西方各国能像中国一样宣扬孔子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思想，并且付之实行，那么，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和平，更加文明。假如全世界都



能宣扬并且实行孔子反对暴力，反对暴乱的思想，那么，甚至世界上的武装冲突也并不是不能和平解决的。因此，我想，七十五位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提出要向孔子汲取智慧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，就是因为孔子的智慧有利于建立世界和平的新秩序。

但从另一方面看来，孔子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，需要与时俱进。由于孔子不赞赏勇士和强者，因此中国历史上只有崇尚圣贤，而不太歌颂英雄；重视脑力劳动，而轻视体力劳动。结果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五百年”，却缺少敢于与天斗争，与地斗争，与人斗争而感到其乐无穷的英雄。于是内忧外患，频频发生。到了20世纪上半叶，中国甚至沦落成了半殖民地。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全球的1%。为了恢复繁荣强盛，中国需要学习西方英雄主义的精神，科学求实的作风。从前有句名言：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，说的是只需要半部《论语》就足够治理国家。到了今天，应该理解为只有半部《论语》可以治国，其他半部已经过时，应向西方取长补短，使《论语》现代化。东西结合，才可以使“智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”。如果每个国家都能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和平共处，共同发展，那么，21世纪的人类就可以过上幸福的和平生活。让我们记住英国18世纪诗人蒲伯的诗句，作为结束：

孔夫子超凡入圣，  
教我们如何做人。

2005年4月18日

# 《老子道德经》英译本序



老子姓李名耳，公元前6世纪人（公元前580—前500），大约比孔子（公元前551—前479）早生30年，是古代中国伟大的哲学家。他的《道德经》五千言，八十一章，是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哲学经典。这部书中外译文很多，我只见到英国韦理的译本，国内则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的《老子道德经》，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的《英译老子》，外文出版社1998年的《老子思想新释》等。这些译本多少逐字直译，各有独到之处；但除韦理把“道”解释为“道路”外，其他译本的“道”都是音译。在我看来，“道”字是本书的关键词，如果音译，则本书的精义损失太大，应该用现代人理解的词语来翻译，才能使老子的思想在全世界流传。其实，“道”是天道、道理、真理、自然规律的意思。《老子》第一章开宗明义就说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第一个“道”字指天道或自然规律，第三个“道”字却指人间正道或社会规律。自然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，而社会规律、伦理道德却是根据人的需要来确定的。因此老子才说：道非常道。意思就是：天道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自然规律不会因为人的好坏而改变。根据这种解释，我把老子《道德经》重新译成现

代读者更容易理解的英文。

如何理解“道”呢？《老子》第四章说：“道冲，而用之或不盈；渊兮，似万物之宗。”这四句话包括了“渊冲”两个字在内。“冲”者虚也，就是空虚无物，无形无影，却又用之不尽，取之不竭。“渊”者深也，就是广博深奥，包罗万象，无所不容，所以像是万物的根源。这两个字说明了“道”的内涵和外表。

《老子》第三十七章说：“道常无为，而无不为。”“无为”不是无所作为，而是不干涉万物的作为，让万物自由发展的意思。所以“道”常无为而万物有为，万物有为是道无为的结果，道无为是万物有为的条件。说“道”无不为，是说万物的作为都是“道”的体现：“道”是抽象的，万物是具体的，万物的所作所为都是“道”的具体化。这是老子重要的哲学思想。第二章中说得更加具体：“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万物作而弗始，生而弗有，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”这就是说，圣人做事，从不干涉别人；他不说话，却能教育别人。万物不用圣人启动，自然会有所作为；万物生长发展，并不属于圣人所有；万物有所作为，圣人并不居功。所以第五十七章总结说：“故圣人云：我无为，而民自化。”这就是说：只要圣人不犯错误，不横加干涉，人民自然会走上正确的道路。无为而治，是老子重要的政治思想。

因为无为，所以不争。《老子》第八章说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”这里把最高的善德比做水，水对万物有利，而不和万物争利；水往低处流，处众人不喜欢的地位，而不和万物争夺上方。这种不争的善德，就接近于无为的天道了。第二十二章又说：“不自见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长。夫惟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”这就更进一步，说不表现自己，所以看得清楚，别人也能看得明白；不自以为是，反能为人理解；不吹嘘自己，反而能够成功；不居功自傲，反而能够领导别人。如果你不争名夺利，争功夺位，天下还有谁能和你争呢？不

争利是老子重要的经济思想。如果国家都像水一样,不和别国争高低;如果人不争夺私利,只利万物,那天下就可以太平了。

如何才能做到不争呢?老子又提出了寡欲的思想。第十九章说:“少私寡欲”,可见老子所说的欲,指的是自私自利的欲望,不是利人利己的思想。所以第一章才说:“故常无欲,以观其妙;常有欲,以观其缴。”因为没有私心和偏见,才能理解“道”内在的奥妙;只有无私的欲望,才能观察“道”外在的表现。

如何才能做到寡欲呢?老子又提出了知足的理论。第三十三章说:“知人者智,自知者明;胜人者有力,自胜者强。知足者富。”为什么要知足呢?因为知道自己比知道别人更难,战胜自己也比战胜别人更难,在心理上了解自己,战胜自己的欲望,那所得到的满足,可以算是精神上的智者、强者、富者了。第四十六章又说:“祸莫大于不知足,咎莫大于欲得。故知足之足,常足矣。”这是从反面来说,若不知足,贪得无厌,反而会引起祸事。所以知道应该满足,不该贪得,那反而是富足的。

无为、不争、寡欲、知足,是老子的人生观。客观上说来,老子却具有辩证统一的世界观。如第二章说:“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,长短相形,高下相倾。”说的就是:有无、难易、长短、高下,都是相对的,没有难就无所谓易,没有长就无所谓短,没有高就无所谓下。所以第二十二章又说:“曲则全,枉则直,洼则盈,弊则新,少则得,多则惑。”这就是说:委屈才能求全,矫枉才能得正,空洼才能盈满,破旧才能革新,太少才会增加,太多反会损失。这种相反相成的观点,使老子得出了刚柔相济的结论。

第四十三章说:“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。”这是老子以柔克刚的军事思想。第七十八章又说:“天下莫柔弱于水,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,其无以易之。弱之胜强,柔之胜刚,天下莫不知,莫能行。”这更用水滴石穿的具体例子,说明柔能胜刚,弱能胜强的道理。这个道理无人不知,但是统治者却无人能行。这话即使到了今天,还



## 任尔东南西北风

有现实意义。例如有的霸权主义国家要用武力统治世界，却失掉了人心，结果到处碰壁。这就是不知道柔能胜刚的缘故。

据说孔子问礼于老子，老子张口不答。孔子看到老子口中有舌无牙，恍然大悟，知道柔能胜刚的道理。后来宋人辛弃疾写了一首《西江月》，前四句是：

刚者不坚牢，  
柔者难摧挫。  
不信张开口角看，  
舌在牙先堕。

说的就是这个故事。

孔子的智慧包括他问礼于老子所得的以柔济刚的道理，还有无为而治，与世无争，清心寡欲，知足常乐的思想。因此，在全球化的 21 世纪，出版这本现代化的《老子》新译本，也许可以让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光辉，对爱好和平的人类作出新的贡献。

2003 年 11 月 1 日